

皇东行郡县，上邹峯山。立石，与鲁诸儒生议，刻石颂秦德，议封禅望祭山川之事”。圣山之名加之邹城的经济中心地位，无疑是秦始皇两度登临峯山的原因。

此次在邹城出土新莽时期的8件铜度量衡器，包括2件诏版、1件货版和5件有铭权、衡，制作精良，是新莽改制的实物证据。它们作为新朝的法定标准器，或许承担着校准的功能。这批铜器集中出土于邹城，说明至少到新莽时期，该地仍然保持了春秋时期以来就已形成的区域经济中心地位。其中的货版（J3①：45）正面中心及四边正中有铭文7字，中间为“黄金”，上为“布”，下为“铜泉”，左为“帛”，右为“絮”，应该与王莽币制改革中所施行的“宝货五品”有关。《汉书·食货志》：“凡货，金、钱、布、帛之用，夏、殷以前其详靡记云。太公为周立九府圉法：黄金方寸而重一斤；钱圉函方，轻重以铢；布、帛广二尺二寸为幅，长四丈为匹。故货宝于金，利于刀，流于

泉，布于布，束于帛”。但据《汉书·王莽传》所记载：“莽以钱币圯不行，复下书曰：‘民以食为命，以货为资，是以八政以食为首。宝货皆重则小用不给，皆轻则僦载烦费，轻重大小各有差品，则用便而民乐’。于是造宝货五品”。但结果却是“百姓不从，但行小大钱二品而已”。新莽改制以失败告终。

据发掘简报，出土铜权、衡的地点位于汉代官署区，而且出自一口废弃的水井内，推测弃置行为与西汉末年的社会动乱有关，是有道理的。据史料记载，王莽时，琅邪人樊崇起兵于莒，为区别于莽军，乃皆朱其眉以相识别，“后数岁，赤眉遂寇东海，与王莽沂平大尹战，败，死者数千人，乃引去，掠楚、沛、汝南、颍川，还入陈留，攻拔鲁城，转至濮阳”（《后汉书·刘玄刘盆子列传》）。赤眉军上述战事，均距邹城甚近，权衡的弃置，以及衡杆的毁器，可能与此动乱有关。自此而后，邹城的区域经济中心地位似乎也就此终结了。

邾国故城新莽铜诏版和铜环权简论

白云翔（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2017年，山东省邹城市邾国故城遗址“皇台”东北部的3号井出土8件新莽时期铜器，包括诏版2件、货版1件、残衡杆1件和环权4件。新莽时期的铜度量衡器及相关遗物以往虽有所发现，但均非考古发掘所获。而邾国故城遗址的这批铜器是科学的考古发掘出土品，具有明确的空间和共存物关系，为新莽时期的度量衡及相关问题研究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可靠的实物资料。因此，这一发现不仅是秦汉考古的一次重要发现，也是古代度量衡器的一次重要发现。邾国故城遗址的这批新莽铜器，可资研究的学术问题甚

多，这里结合以往的发现和文献记载，仅就铜诏版和铜环权的有关问题略作讨论。

（一）关于铜诏版

邾国故城遗址的新莽“同律度量衡”铜诏版，系考古发掘首次出土。此前，这种铜诏版仅有1982年甘肃合水县定祥西庄采集的1件（花平宁、李永平：《新莽“戊辰诏书”紫铜刻版》，《丝绸之路》1988年第1期）。作为征集品，上海博物馆收藏有新莽“同律度量衡”铜诏版1件和铭刻有“同律度量衡”诏书的铜衡杆1件（唐友波：《上海博物馆藏新莽衡杆与诏版及诏书解读》，见

《上海博物馆集刊》第十一期，上海书画出版社，2008年）。此外，1926年在甘肃定西县秤钩驿因山洪冲毁山原而发现新莽铜器8件，包括铜环权5件、衡杆1件、钩1件和丈1件。出土后经多次转手，到20世纪50年代，铜衡杆和2件铜环权入藏中国历史博物馆，其余5件流散到台北（傅振伦：《甘肃定西出土的新莽权衡》，《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79年第1期）。其中，铜衡杆、铜丈和1件铜环权上铭刻有81字“同律度量衡”诏书。

邾国故城铜诏版，其形制为方形薄板，边长约25.5厘米（折合西汉的一尺一寸），正面中部用篆书分九行铭刻有王莽“同律度量衡”81字诏书。从形制、大小和铭文内容、格式及字体等看，合水铜诏版及上博藏铜诏版与之基本相同（表一）。由此可知，当时对于这种铜诏版的制作，形制和诏书的铭刻，都有统一的标准和严格的规定。一般认为，这种铜诏版当时是镶嵌在木质计量器具、最有可能是方斛上使用的。

邾国故城两件铜诏版的铭刻内容完全相同：“黄帝初祖，德币于虞。虞帝始祖，德币于新。岁在大梁，龙集戊辰。戊辰直定，天命有民。据土德，受正号即真。改正建丑，长寿隆崇。同律度量衡，稽当前人。龙在己巳，岁次实沈，初班天下，万国永遵。子子孙孙，享传亿年”。邾国故城3号井同出的铜环权（J3①：49）和铜衡杆（J3①：39）上的铭刻与之相同，只不过是分作20行，并且铜衡杆铭刻的前五句残缺。这种“同律度量衡”81字诏书，还见于定西秤钩驿铜衡杆、铜环权和铜丈等新莽度量衡器上，其内

容与铜诏版完全相同。实际上，这一诏书在《汉书》等当时的文献中无载，而在魏晋时期以后曾多次发现铭刻有这种诏书的度量衡器。据《隋书·律历志》记载，北魏景明年间（公元500～503年），并州王显达献古铜权1枚，其上铭刻有新莽“同律度量衡”81字诏书，以及“律权石，重四钧”（《隋书·律历志上》）。关于新莽“同律度量衡”诏书，学界多有考释和解读，可知是新莽始建国元年（公元9年），王莽为统一度量衡而颁布的诏书，此处不赘。这里需作补充说明的是，《隋书·律历志》所记诏书中将“天命有民”记为“天命有人”，或为避唐讳而将“民”改为“人”；同时，将“享传亿年”记为“享传亿年”，而“亨”、“享”二字相通。

（二）关于铜环权

邾国故城出土铜环权4件，形制相同，但大小、重量和铭文各异（表二）。以往能够确认为新莽时期的铜环权，仅有甘肃定西县秤钩驿出土的5件和1981年湖北枝江问安公社黄土岗出土的5件（枝江县文化馆：《湖北枝江县出土王莽时期铜砝码》，《文物》1982年第1期）。至于其他无铭刻而不能确认其年代为新莽时期或近代金石学著作著录的新莽铜环权（丘光明：《中国历代度量衡考》第410页，科学出版社，1992年），这里暂不计入。根据上述发现，关于新莽时期的铜环权，可得出如下认识。

形有定制。铜环权呈扁平环形，断面多呈椭圆形，并且直径、孔径和环体宽度之间有相对应的比例关系。《汉书·律历志》

表一 新莽“同律度量衡”铜诏版一览表

名 称	尺寸（厘米）	重量（克）	铭 文	备 注
邾国故城诏版 （J3①：40）	边长25.5～25.9、厚0.48～0.62	2659.5	81字诏书	正、背面边长略有差别，此尺寸为正面数据
邾国故城诏版 （J3①：41）	边长25.7～26.1、厚0.49～0.58	2731.7	81字诏书	同上
合水诏版	边长25.3～27、厚0.17	950	81字诏书	
上博藏诏版	边长25.7～25.9、厚0.2～0.4	1617.5	81字诏书	左下角有一小穿孔

表二 新莽铜环权一览表

器物号	尺寸（厘米）	重量（克）	折合斤的单位量值（克）	铭 文	备 注
邾国故城J3①：46	直径6.7、孔径2.3、高3.64	737.5	245.83	15字，“律三斤始建国元年正月癸酉朔日制”	三斤权
邾国故城J3①：47	直径9.7、孔径3.2、高5.05	2224.7	247.18	15字，“律九斤始建国元年正月癸酉朔日制”	九斤权
邾国故城J3①：48	直径16.8、孔径5.3、高5.9	7649	254.97	18字，“律权钩重卅斤始建国元年正月癸酉朔日制”	钩权
邾国故城J3①：49	直径27.5、孔径7.9、高9	29775	248.13	81字诏书（略）；另有6字，“律权石重四钩”	石权
定西秤钩驿C：01	直径6.5	730.1	243.37	可辨“三斤”2字	三斤权
定西秤钩驿C：02	直径7.1	1446.1	241.02	可辨“律六斤”3字	六斤权
定西秤钩驿C：03	直径10.35	2222.8	246.98	15字，“律九斤始建国元年正月癸酉朔日制”	九斤权
定西秤钩驿C：04	直径30.4	14775	246.25	15字，“律二□（钩）始建国元年正月癸酉朔日制”	二钩权
定西秤钩驿C：05	直径28.05	29950	249.59	81字诏书（略）；另有6字，“律权石重四钩”	石权
枝江黄土岗C：01	直径11、孔径4	2400	240	15字，“律十斤始建国元年正月癸酉朔日制”	十斤权，原报告将“律”字误释为“衡”字
枝江黄土岗C：02	直径9.5、孔径3.5	2200	244.44	15字，“律九斤始建国元年正月癸酉朔日制”	九斤权，原报告将“律九斤”误释为“衡八斤”
枝江黄土岗C：03	直径6.5、孔径2.5	700		铭文不清	
枝江黄土岗C：04	直径5.7、孔径2	460		铭文不清	
枝江黄土岗C：05	直径4.5、孔径1.5	不详		无铭文	

说明：秤钩驿出土铜权的编号是笔者为便于表述所加。

载：“权者，铢、两、斤、钩、石也，所以称物平施，知轻重也。……二十四铢为两，十六两为斤，三十斤为钩，四钩为石。……五权之制，以义立之，以物钩之，其余小大之差，以轻重为宜。圜而环之，令之肉倍好者，周旋无端，终而复始，无穷已也”。如淳注曰：“体为肉，孔为好”。也就是说，权的形制为环形，一侧环体宽度与孔径相同，即环体的外径是孔径的三倍。新莽五权之中，铢权和两权尚无可靠的实物资料，但从斤权、钩权和石权的实测数据来看，虽然环体宽度与孔径的比例因个体不同而异，并且差别明显，即1：1.6至1：2.48，但环体宽度为孔径两倍左右者占多数，实物资料也大体印证了文献记载。至于各地所见铜环权的具体尺寸规格与当时的规定不完全相符，可能与制作地或制作时间的不同有关。

铭有定式。铭文主要刻写在权体的外

侧，其格式、字数及内容根据其标称值的大小而不同。斤权一般为15字铭，即“律×斤，始建国元年正月癸酉朔日制”。钩权，一种为15字铭，如秤钩驿铜权C：04为“律二□（钩），始建国元年正月癸酉朔日制”；另一种为18字铭，如邾国故城J3①：48铜权为“律权钩重卅斤，始建国元年正月癸酉朔日制”。石权为6字铭“律权石重四钩”加上“同律度量衡”81字诏书，分别铭刻在权体的两侧，如邾国故城J3①：49和秤钩驿C：05即是。

大小系列成套。新莽五权之中，目前基于考古发现可以确认实物者只有斤权、钩权和石权三类。斤权发现有三斤权、六斤权、九斤权和十斤权等四种，但实际上至少还应有一斤权和二斤权（枝江黄土岗C：05和C：04可能即是）。若此，新莽时期可能至少是由一斤权、二斤权、三斤权、六斤权、九

斤权和十斤权等六种构成斤权系列。钩权有两种,即一钩权(邾国故城J3①:48)和二钩权(秤钩驿C:04)。石权仅有一石权,邾国故城J3①:49和秤钩驿C:05均是。

重量单位有标准量值,但多有差别。西汉及新莽时期,称重的衡器是等臂式衡杆(不等臂式杆秤出现于东汉时期),即天平,权实际上是这种天平的砝码,根据其自重刻铭可计算出当时重量的单位量值。迄今所见新莽铜环权中,除枝江黄土岗的无铭文和铭刻不清的3件外,其余11件根据其自重刻铭和实测重量可知,一斤的单位量值在240~254.97克之间。如果将其单位量值最低者(黄土岗C:01)和最高者(邾国故城J3①:48)舍弃不用,其余9件一斤的单位量值为241.02~248.13克,平均值为245.87克。如果按标称值的不同分类计算,6件斤权的平均值为244.8克,2件钩权的平均值为250.61克,2件石权的平均值为248.86克。如果分地点测算斤的单位量值,邾国故城的4件,平均值为249.03克;秤钩驿的5件,平均值为245.44克;枝江黄土岗的2件,平均值为242.22克。按照现代通行的根据实物标重和实测重量测算古代度量衡单位量值的算术平均法计算,并且假设斤权的误差可能会小于钩权和石权,那么可以将6件斤权的平均值244.8克、约合245克作为新莽时期一斤的标准单位量值。这个量值,与以往的推算结果基本一致(丘光明等:《中国科学技术史·度量衡卷》第244页,科学出版社,2001年)。据此观之,邾国故城铜环权超出标准量值较多,秤钩驿的铜环权也略超出标准量值但最为接近,而黄土岗的铜环权则低于标准量值较多。

铭刻中的“制”字,其义为“制定”、“制度”而不是“制作”。迄今所见带有铭刻的新莽铜环权,无论斤权、钩权还是石权,均有“始建国元年正月癸酉朔日制”。对于其中的“制”字,过去往往理解为“制作”,

甚至在繁体字的出版物中,将“制”转写成“製”。于是,这句铭文一般被解释为公元9年正月初一制作,进而认为“当时似铸造了大量的标准器,分发各地方”。这就涉及到“制”字的释义问题。的确,在古今汉语中,“制”都有制造、制作、制定、规定、限定、制度等义。汉代文字中,“制”和“製”字均有,许慎的《说文解字》将两字均释为“裁也”。但是,新莽铜环权铭刻中,均写为“制”而不是“製”。据检索,考古发现的包括新莽时期在内的汉代铜器上,凡是记器物制作之时间、地点、工官乃至工匠者,无论是日用器具、乐器还是兵器等,或用“造”,或用“作”,或用“造作”,但从未见用“制”字(徐正考:《汉代铜器铭文选释》第685~749页,作家出版社,2007年)。同时,汉代铜器铭文中尚未见“製”字,而“制”字仅发现于新莽度量衡器上,并且仅用于格式性铭文“始建国元年正月癸酉朔日制”(徐正考:《汉代铜器铭文综合研究》第457~815页,作家出版社,2007年)。由此观之,新莽度量衡器铭文中“制”字的含义并非是制造、制作,而是制定、规定、制度。这从汉代文献中“以皇帝之诏称‘制’”、“制礼作乐”、“异器制”等可以得到佐证。若此,“始建国元年正月癸酉朔日制”便说的是始建国元年正月初一制定统一度量衡的制度,而不是这一天制作铜环权等度量衡器了。换言之,“始建国元年正月癸酉”并非铜环权制作之时日,而是统一度量衡制度的制定颁行之时日。

(三) 关于铜诏版和铜环权的制作与使用

由于考古发现的新莽铜诏版的形制、大小相近,铭文内容及字体相同,铜环权的铭文也相同,于是,以往学术界认为“刘歆当日所造是很多的”,或“王莽在始建国元年颁布了一大批度量衡标准器”;或认为“新莽时期凡刻有‘始建国元年癸酉朔日制’等字样

的度量衡器都是由中央统一制造后发至地方使用的标准器”。其实并不尽然。

就铜诏版来说，迄今所见之4例，尽管其形制和大小相近，铭文的内容和格式相同，字体同为篆书，但详察之后会发现，各地出土铜诏版上诏书的刻写还是存在着一定的差别，有的还差异明显。更值得注意的是，邾国故城2件铜诏版的最大厚度为0.58厘米和0.62厘米，远比合水铜诏版的厚度为0.17厘米要厚得多，因此其重量也相差甚远。这显然无法仅仅用制作工匠的不同来解释，而可能是制作地或制作时间的不同所致。对此，或可有两种解释。一种可能是，新莽中央政府在同一个地方的不同年份先后制作了这种“同律度量衡”铜诏版，分发至各地使用；另一种可能是，新莽中央政府规定了这种铜诏版的形制、大小以及铭文的内容、字体和格式等，由多个地方分别制作，然后分发至各地使用。

就铜环权来说，各地的发现尽管在形制上相近，并且铭文的内容、字体及格式也相同，但如前所述，各地所出铜环权不仅在形制上“肉倍于好”的差异明显，而且其单位量值更是差别甚大。一斤的平均单位量值，邾国故城的4件为249.03克，秤钩驿的5件为245.44克，枝江黄土岗的2件为242.22克，更何况黄土岗C：01为240克，而邾国故城J3①：48为254.97克。研究表明，上述差异无法用当时存在着大小度量衡、或地区性差

异、或不同时间度量衡值有所变化等进行解释（《汉代铜器铭文综合研究》第172～175页）。前已述及，铜环权铭文中的“制”字，指的是制定、规定而不是制作、制造，于是也就不存在始建国元年正月初一这一天制作铜环权标准器的问题了。或可认为，王莽正式称帝、新朝正式建立的始建国元年正月初一，在发布“同律度量衡”诏书的同时，还规定了铜环权形制、规格以及铭文的内容、字体和格式等，分别在多个地方按规定制作，然后分发至各地使用。

至于出土铜诏版和铜环权的地点，“不是监制权衡的地方，但可能是安置官颁权衡标准器的处所”。因此，各地发现的新莽铜诏版和铜环权，并非日常生产和生活中的用器，而是各地用于监管的法定标准器。据此看来，新朝正式建立的始建国元年正月，王莽即发布了“同律度量衡”诏书，并就铜诏版、铜环权等的形制、规格及铭文的内容乃至格式和字体等作出明确规定，并强力推行，成为王莽改制的重要一环。新莽铜诏版和铜环权在西北至甘肃定西（汉属天水郡）、合水（汉属北地郡），南至湖北枝江（汉属南郡）的考古发现表明，新莽统一度量衡的政令的确推行到了全国各地。但同时，各地铜环权单位量值多存在差异也表明，新莽衡制在各地似乎并未得到严格执行。这对于考察新莽改制及其实施状况，是颇有意义的。

邾国故城出土新莽衡器的初步认识

孙 机（中国国家博物馆）

2017年在山东邹城市邾国故城遗址的考古发掘中于汉代水井（3号井）内出土了8件新莽时期的铜度量衡器，这是一次重要的

考古发现，为研究新莽改制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笔者根据发掘者提供的基础资料，对其中5件新莽衡器谈几点初步意见。

山东邹城市邾国故城遗址新莽 铜度量衡器的初步研究

关键词：邾国故城 铜度量衡器 始建国元年 新莽改制

KEYWORDS: Ancient City Site of the Zhu State Bronze Measuring Devices
First Year of Shijianguo Era Wang Mang's Reform

ABSTRACT: During the excavation to the Ancient City Site of the Zhu State in Zoucheng City, Shandong in 2017, from a water well (numbered as J3) of the Western Han Dynasty, eight bronze measuring devices of the Xin Dynasty (Wang Mang Interregnum, 8–23 AD) were found, the inscriptions on which showed that they were cast in the first year of Shijianguo Era (9 AD), and related to Wang Mang's reform recorded in the historical textual materials. Through the experts' symposium and preliminary studies, the agreement is made that this set of bronzes is the bronze measuring devices of the Han (Xin) Dynasty scientifically unearthed by archaeological excavation for the first time with the most types and quality, which provided rare physical materials and have significant academic values for the researches on the important historical events such as Wang Mang's usurpation of the Han throne at the end of the Western Han Dynasty and his reforms of the monetary and measurement systems, as well as the history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measurement systems of China.

编者按：邾国故城遗址位于山东邹城市峰山镇纪王城村周围，是东周时期邾国的都城和秦汉至两晋时期的邹县（驺县）县治，作为都城和县城使用的时间长达1100年（公元前614年至公元556年）。2017年6月，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等对该遗址进行发掘时，在一眼西汉水井（J3）内出土了8件新莽时期的铜度量衡器，包括衡1件、权4件、诏版2件和货版1件。每件铜器都有铭文，显示可能铸造于始建国元年（公元9年），铭文内容与文献记载的新莽改制有关。为了充分论证这批铜器的学术价值，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和文化遗产研究院在9月2日举办了专家座谈会，与会学者对这批铜器的铭文内容、制作与使用情况，及其所反映的新莽改制的历史评价和度量衡发展史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专家们一致认为，这批新莽铜器

是迄今为止首次经过科学发掘出土，也是一次性集中发现数量和种类最多的汉代度量衡器，制作精良，保存较完好，铭文字数多，透露的历史信息丰富而重要，为研究西汉末年王莽代汉并实行货币和度量衡制度改革等重大历史事件，以及我国度量衡发展史等问题，都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具有重大学术价值。另外，这批铜器出自邾国故城遗址的宫殿区“皇台”之上，证明“皇台”范围内应存在汉代官署区，这对研究遗址的城市布局和功能具有重要意义，也为下一步的田野工作提供了重要线索。在此次专家座谈会成果的基础上，本刊约请与会学者对这批重要的考古新材料进一步加以研究，从不同角度阐释其重要的学术价值。现将初步的研究收获予以发表，希望引起学术界的关注，也期待相关研究的继续深入。